

特大案件的侦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李宇宏

封面设计: 冬妮

特大案件的侦破
Teda An Jian De Zhe Bian

梁世威 许延庆 编译
章礼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1号)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 14/16

字数: 230,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07-02424-X/I·409 定价: 5.20元

我一直嫉妒那些体育观众和球迷，嫉妒得要命。

他们有强大的靠山，对他们有着特殊的关照。你们想想看，为他们修建了多么雄伟壮观的体育场，可容纳下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有时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居民，如：蒙特卡罗）。要不怎么叫体育宫殿呢！

有时我不由得想入非非，电视似乎是专门为他们而发明的。您不信，请看一下，琢磨一下电视节目表。很少有那一天没有足球或者是冰球比赛，再不就是水球、散打、举重……若不，说不准那一天，就给你来上接二连三的比赛。我的嫉妒之心之所以无法平息，是因为我也有强烈的爱好，对它的迷恋之深较之其他人也不让分毫。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实：当贝斯梅尔特诺娃演唱日泽利的独唱时，或由马克西莫娃和瓦西里耶夫主演歌剧《斯巴达克》时，你搞来一张大剧院的戏票试试。

但是，有什么可以和这样的感觉相比，当你的手里握着一张普普通通而又十分珍贵的纸片，在那一队不幸跨入你的圣堂大门的人身边走过时，有什么可以和此时此刻的感觉相比呢？于是，你成为一起唯一的、空前绝后的事件的证人。我就不必再去赘言那时的情景了……对奇迹的庄严的期冀，一种参与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激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简直不能不去欣赏基勃卡洛演出的《费加罗的婚礼》。没有这个权利！

在歌舞剧中心售票处当然没有票。我到大剧院售票处去碰了碰运气，但愿能走运！

这样，不得不在一大清早就起来，叫辆出租车（地铁还没开门），向大剧院的售票处驶去。当司机得知起大早赶路的客人去什么地方时，不由怀疑地扫了我一眼。而当看到有一大帮和我一样的“精神病”时，又同情地摇了摇头。

在这之后，我仍很紧张；还有票吗？有票，不过只有三个星期以后的戏票。而这已经被认为是很走运的了。

在上演的那天，我从一大早就如同“大阅兵”一样紧张。因为，演出在下班后一小时就开始，从我上班的位于库兹涅茨基桥的全俄最高检察院匆匆忙忙赶到我的住所巴什基纳街，然后再返回市中心是不可思议的。好在从我的机关到大剧院只有十分钟路程。一切按时刻表进行。

四点钟，娜佳打来电话，打听行程有没有变化。

娜佳就在我们邻近的时装店工作。我们第一次（我非常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邂逅”，是在艺术工作者中央俱乐部的餐厅里。我们把司空见惯的午餐菜谱递过来、送过去，直到我终于下决心说点什么，与水包子肉汤和煎牛排无关的一些话。原来，她也有进一步结识的愿望。可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相识却走上了我久久摸不清头绪的方向。我的女伴话总是离题万里，有一个建筑安装处长时间在她家周围掘沟，并破坏电话电缆。

我暗示道，直接的人际交往要比用电话好得多。她还是喋喋不休地自顾自地谈电缆线、建筑安装处……一切都在一瞬间豁然开朗了，娜佳把我当成了电话局的工作人员，不错，检察院的哥们儿从前也佩戴过肩章。而现在我们的命运不过是领章上不起眼的小星罢了。

知道了我的真正职业之后，她明显地尊敬我了，我也为娜佳不是时装模特而感到高兴。不错，是位具有模特身材的

时装设计师，这样的身材很能激动男人的想像力——没有家室之累的自由想像。尽管，最后弄清楚了，她也是从女时装模特干起的，这又有什么呢，我不也是从侦查员干起的……

就在那一天，我向娜佳证实了一诺千金的涵义，而这意味着她向领导阿格涅萨·彼得罗芙娜请假，我已有幸和她在电话里相识了。请假后她要回家去换衣服，再赶到最左边的圆柱下赴约。

五点钟，医院给我打电话来。给我治病的五官科医生说，他们科里明天可以空出一个床位。我理所当然地感到一阵高兴，并且在电话里讲了这个意思。而当放下电话之后，才感到后背发凉。当别人就要把一把解剖刀伸到你的嗓子里的时候，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嗨！有什么办法，很明显，是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刻了……

，五点一刻的时候，法伊诺奇卡到我办公室瞧了一眼。这位娇小玲珑的女性长着个小翘鼻子和一头棕色的鬈发。她是共和国副检察长的女秘书。

法伊诺奇卡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函授法律学院入学考试中翻了车，但是法律学仍然使她醉心，所以她就到检察院工作了。

她穿着一条很朴素的短连衣裙，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富有人情味，无论是言语还是举止。一看见她，我便阴郁地想：真的有朝一日她也要磨出一副彬彬有礼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秘书作风？

“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请您下班前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的电话总是占线，所以，如果领导要找我，她是不吝于爬这两层楼的。

她侷促不安，满面羞红，但还是会来的。确实，在小食堂（如果我没有时间去艺术工作者中央俱乐部餐厅的话），她从不和我同坐一个餐桌。这一点成了开玩笑的最好借口，这常常被我的一些同事兴致勃勃地大加利用。这样，常把姑娘搞得面红耳赤。

“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正忙着吗？”我问道。

“他根本不在，到部里开会去了，您可得等他回来。他关照过……”

“这些关照，更像是命令。”我说。

法伊诺奇卡皱起小鼻子：作出乐意帮忙、但又毫无办法的样子。在她关上门之前，我又请求道：“他一回来，您就来个电话好吗？”“一定的，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她的一头鬓发消失了。

看来，明天十二点钟之前要去医院，得带上个小包裹，装上些纸袋、电动刮脸刀、牙刷……我打算住院已经一年多了，没想到这样快，明天就要去。在半天的时间内，得做一大堆事情。要给洗衣店去电话，让他们不必把衣服送来了；还必须交付水电费，已经拖欠两个月了。在工作方面，上帝保佑，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一个星期天无足轻重。不错，我听人说过，手术后一段时间内是不允许讲话的。具体多长时间，这还要打听清楚，不能讲话的侦查员算是什 么 侦查员……

眼看要到六点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法伊诺奇卡来电话，便下楼来到副检察长的接待室。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还没有回来，他的女秘书神情窘迫，好像领导不在是她的过错似的。

当然了，六点整，我和所有人一样，有权利下班。在制

度上这是站得住脚的……我不知道是否有敢于对领导吩咐不恭的人，况且，制度也并不完全站在我的一边。我的这一天安排的也不合乎规定……我愁容满面地坐在了法伊诺奇卡桌边扶手上。

姑娘仍在继续飞快地敲着打字机，不时地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大概出于幼稚，她认为自己有义务与首长一起离开，或者得到他的允许。

也许是为了使我在接待室里不感到寂寞，今天她才留下来没有下班？

六点一刻，我开始感到烦恼不堪了。给娜佳打电话毫无意义，她已在路上。

尽管我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十分尊重，但此时此刻，在我的心中对他的看法也实在不敢恭维了。

为了以防万一，我又跑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娜佳也可能来个电话。但电话机没有铃声。

这时我又下楼回接待室，一路小跑为的是不耽误每一秒钟。

但副检察长还是不在，我又回自己办公室去了一趟。在走廊里我就听到了电话铃声，我连忙向我的房门扑去。

不是娜佳，来电话的是我正要结案的见证人，我尽快地应酬过去，以免占线。

我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您还在办公室吗？”我听出这是阿格涅萨·彼得罗芙娜的声音。

“在，我现在如坐针毡。”

“我知道今天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但用不了二分钟……”

我知道她的二分钟，于是我说：

“阿格涅萨·彼得罗芙娜，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原谅。现在首长正找我。明天我亲自给您去电话，是急事吗？”

“瞧您说的！好吧，明天也来得及。祝你晚上过得愉快……”

我吐了口气，放下了话筒，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向法伊诺奇卡的房间走去。

差二十分钟七点的时候，我完全失望了。这倒不是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使我那位迷人的时装设计师难堪。即使是只剩最后一分钟，我也能挖空心思通知她我脱不开身。我是在可怜娜佳，她风姿绰绰，形单影只地站在我们的圆柱旁。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还有一种似乎嫉妒的情感在蠢蠢愚动。要知道，剧院里有许多男人，他们年轻而又时髦，但更主要的是我把娜佳的夜晚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我不去，她会怎样想呢？于是，我做出了决定：“法伊诺奇卡，请您帮我一个忙。”打字机停了下来，我从来没有向这位姑娘请求过什么。

“我能做什么？”

“您肯定能办好，请您替我到大剧院去一趟……”

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完全是出卖。我以最粗暴的形式，毁掉了我们的友谊，可能还有她的幻想……

我递给她两张戏票。

她穿上了小大衣，这显然是从“儿童世界”买的，因为在为成年人开设的商店中，未必会卖到这种尺码的。她尽量不看我，问道：“我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

“在最左边的圆柱下，名叫娜杰日达·马克西莫芙娜。

身材匀称，金发。”

法伊诺奇卡用将能听到的声重复说：

“身材匀称，金发……”

“是我妹妹……”我不管不顾地冲口而出。这句话，使我心绪极糟，她鞋后跟的撞击声逐渐在走廊的尽头消失了。我想像着我如何与她一块下楼，走在大街上，在百货大楼附近转向大剧院，我到了。她没有因我迟到而感到惊奇，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然后转身跑向存衣处（娜佳走路很快，很难追上她）。然后是沿着椭圆形的走廊……

二楼的三层包厢到了。枝形吊灯缓慢而又庄严地熄灭了。像弓弦一样绷紧的甜美的静谧延续了一分钟。现在世界爆发出强奏的妙如天音的序曲，帷幕也随之拉开了……

“这是您吗，奇库罗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在接待室的中间，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一阵。

他打开了办公室的门，第一个走了进去，我跟在后边。

莫扎特飞到了九天云外，我站在副检察长的桌旁。

“您请坐。”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疲倦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还在心事重重地皱着眉头。

我对他称我为“您”警觉起来。在副检察长的嘴里，只有当他对下属不十分满意的时候，才使用这个词。我盯着他的头发，那么整齐地从秃头的一边倒向另一边，好像是每一根头发都准确地知道自已的位置。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紧接着，又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

“怎么，你有什么事吗？”

“你”表示好感。

“不是我有事，而是您。”我一块石头落地回答说。

“对，对，对……”他从保险箱里拿出一本天蓝色的卷

宗。我估计大约有一百页。

“这不，请你熟悉一下吧。”

“紧急吗？”

“常言道，着急惹人笑。明天早晨再开始吧，头脑也清醒，你不太忙吧？”

“不忙。”

“那好吧。”他低声说，抬起头，意思是谈话结束了。

我告辞后，便走了出来。没有更多的指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从来不说第二次。

我完全忘了告诉他，我明天要去住院的事。我没有翻阅那本天蓝色的卷宗，把它扔进了我的保险柜里，直到这时，我才想起住院的事。

窗外秋天早到的暮色已经十分浓重，窗玻璃里映出我最时髦的礼服领带，鲜艳得像一只金凤蝶，这是娜佳的礼物。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起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我公事公办地称“您”。他不喜欢有人上班时，不穿制服办公。虽然他允许在检察院外各人穿戴随其所好，曾有一次，他把他以前的女秘书训得差点没掉下泪来，她上班时，穿着一条相当短的连衣裙（那正是超短裙盛行的时代）。记住了首长的训斥，这位姑娘在非工作时间再也不敢穿时装了。

当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嘲笑那些穿起超短裙的半老徐娘时，那可真妙，他说：

“比如说，嘉丽娅穿这个合适（那位女秘书叫嘉丽娅），而有些人穿上只能令人可笑。”

原来，是我的领带激怒了他，但是他是否知道，他今天是怎样无意之间伤害了我。

而当我想冷静一下时，我便进行思索。从实质来说，伊

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什么过错吗？别人耽搁了他，那些耽搁他的人，可能也是出于某种情况不得以而为之，而这些情况……

我开心地笑起来，逻辑有时也能帮上一些忙，事实总是会获胜的。主要的是在我的一生当中，再也看不到今天的演出了，逝者不可追。最使我感到沮丧的是，我错过这次机会是因为一件完全可以推到明天的事。

我的充满爱情的年轻人的美好夜晚，就这样被断送了。

就在娜佳和法伊诺奇卡欣赏歌剧之时，我却在咖啡店里心甘情愿地排队，心甘情愿地坐在那里，靠一杯咖啡打发这光棍的时光，吃顿晚饭。

然后，我站在地铁入口处的阴影里，尽力不放过两个女人的身影：娇小玲珑的几乎像是少女的法伊诺奇卡和身材更修长、更匀称的娜佳的身影。

她们夹杂在走出剧院的观众中，一闪而过，我跑过去追，盯着娜佳那美丽而蓬松的发式。有女秘书在场，我不敢靠前，要是娜佳已经揭开了我的关于我们是近亲的谎言，那可叫我怎么办？

跳上一节邻近的车厢，在暗中透过玻璃窗盯着她们。法伊诺奇卡先下车，留下了娜佳一个人，我在各式各样颜色的大衣中，找到了她那闪光的大衣，跟了过去。

在地铁的出口处，我赶上并挽起了她的胳膊。

“满勇敢啊！”一个奇怪的低沉的嗓音说，但手并没有抽回去。一个素不相识的金发女郎用略带嘲弄的目光望着我。

我好像是道了歉，至少是不停地嘟哝了一些话。然后，在广场上转来转去，寻找娜佳。

到处都是高高的金发女郎，都穿着那该死的闪光大衣。好像整个莫斯科都迷上了这种衣着，于是，我在内心诅咒这种时髦，闷闷不乐地走到了娜佳住处对面的自动电话亭。

“你还在工作吗？”娜佳丝毫没有奇怪地问。

“对，你知道吗……”我一边望着六楼的窗户一边脱口而出。

“不要道歉，我们不是说定了吗……”

“演出还好吗？”

“我本来以为会更好些，不过，总起来说，还可以……伊戈尔，那个姑娘似乎爱上你了吧？”我感到她在窃笑。

“你说些什么呀，她还年轻，在这种年龄，或多或少地似乎喜欢每一个人……”我确信不移地说。

“高个的男子？”娜佳点透了，并开心地大笑起来。我感觉到，她在吃醋。

“瞎说，法伊诺奇卡是很温顺的……”

“我亲爱的精通人类灵魂的行家，女人的心却是个谜。”

“也不比男人的更难猜，娜佳，你过去是穿闪光的大衣吗？”我反击着，我极想结束这个话题。

“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我想你了，我就猜测你穿什么衣服。”

“是穿那种。怎么，这是侦查员的直觉？”

“我不过是想，整个莫斯科都在穿这种大衣……你毕竟是位时装模特……”

“这事还真值得琢磨一下，你明天来电话吗？”娜佳半开玩笑地说。

“一定。对了，娜佳，我想把扁桃腺切除……”

“这一定很可怕吧？”我听出，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真诚的担忧。

“我也不知道，做完以后我告诉你。”

“来电话，一定要……”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来得及脱下睡衣，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是奇库罗夫同志吗？”

“是。”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让您熟悉案情后马上到他那里去。”

“好吧。”我说。

一切都完了，我的谎言被揭穿了，法伊诺奇卡把我从朋友名单中一笔勾销了。我的心境即可笑又可悲。总而言之，是愧悔莫及。也许，还有转机，在我的门口，再次出现那个鬃发翘鼻子的小脸儿……让我们等着瞧吧。不知是那个伟大的作家说过：“女人是不会原谅人的。”好像是大仲马。

坐下研究订在蓝色夹子中的案卷之前，我得往医院打个电话。我要忙一整天，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了。大夫不会惊奇的，这是重复多次的事了。

“您知道吗，什么在等待着您。”他用一种不祥的口吻问道。

“知道，风湿性心脏病。”他已经把这个病名根深蒂固地打进了我的脑海。

“至少，不要再到我这里来了……”医生洋洋得意地说。

“要去的。”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简短地问：

“什么时候？”

“明天，也许要过两天。”

“喂，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

在蓝色的卷宗里，有109页纸，是一起自杀案件。

两个月前在阿尔泰边区北湖区克雷拉托村，灯塔国营农场幼儿园的保育员安格莉娜·谢尔盖耶芙娜·扎列斯卡娅自杀身亡，她生于1947年。

阿尔泰边区检察院的主任侦查员认定如下：

7月8日晚上，国营农场的司机科洛莫伊采夫自带一瓶伏特加到扎列斯基夫妇家中作客。科洛莫伊采夫和扎列斯基喝完这瓶酒之后，还想再喝。扎列斯卡娅制止了他们。但扎列斯基对她大声吼叫，并和科洛莫伊采夫一同到后者的家里去了。在路过食品店的时候，又买了一瓶伏特加。在科洛莫伊采夫的家里，他们又把酒喝光了。在这之后，他们还喝了科洛莫伊采夫家中的酒精。他们不记得具体喝了多少酒精。扎列斯基饮酒过量，只好留在科洛莫伊采夫那里过夜。科洛莫伊采夫的房东是马秋申娜。到了7月9日的早上，扎列斯基和科洛莫伊采夫醒来之后，决定到扎列斯卡娅那里去为昨天的行为道歉。

早上，九点刚过，他们来到扎列斯基的家（扎列斯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他们在屋里床旁的地板上，发现了扎列斯卡娅的尸体。死者的右手搭在被子上，在她的身边有一把张开的剃刀。

在扎列斯卡娅的颈部，有一道宽宽的刀口。

扎列斯基和科洛莫伊采夫跑到街上，开始招呼邻居。随着他们的呼声，跑来了伊万诺娃和雷勃津，他们都是邻居。扎列斯基请人帮忙叫急救车。但雷勃津说：叫急救车已经晚了，应该给民警局打电话。科洛莫伊采夫跑去找管区的民警督察员。伊万诺娃在另一间房子里的桌上发现了扎列斯卡娅的遗书。开头语是：“我亲爱的！我爱你……”

区检察院侦查员、民警少尉利涅维伊请来了管区督察员和北湖区内务部分局刑警队，他们在十二点零三分赶到了现场……

我看了现场拍的部分照片……

在尸检后，法医得出结论：扎列斯卡娅的死亡发生在7月8日二十三点到7月9日二点之间。解剖之后，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法医的鉴定报告中还指出：扎列斯卡娅已有六个月的身孕。

案卷中，这个地方用红铅笔着重划了一道。原来这是一案二命……

遗书写在三张学生用簿格纸上，字迹工整而浑圆，这种字体肯定是从学校毕业后再也没有变化过。

“我亲爱的！我爱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爱过。从我们见面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控制自己的感情。当时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很难彻底敞开心扉。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你有时说不会和我结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将会在一起，因为我爱你。

降临在我们感情命运上的考验，没能压垮它。我坚信，

你是真诚爱我的，你为使我幸福而不遗余力。可这个感觉并没有给我安宁，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当我感觉到降在我头上的蔑视和诅咒时，我不由得浑身颤栗。你曾说，只有真正的感情才能历经矛盾和冲突，而保持无瑕。我乐于相信，也极力说服自己，我的爱情正是这样的。但我所做的，却仍然使我无权，使我的感情比上你的感情。假如我能够战胜自己，变得纯洁，努力变得更美好一些，可这是不可能的。对你背叛的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一提起这件事，就挥之不去，除此之外，尽管认识到这一点是痛苦的，就是在这里，在克雷拉托，我在你的面前也是有罪的。不要寻找罪过者，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是未能避祸消灾。对此我不能原谅自己。特别是现在，你和我在一起，你完全爱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曾温暖过两颗心的精神上的亲密之情，那把两颗心连在一起的纤细无形的情丝已经断裂了，是被我拉断的。它们现在是连接不起来了。即使勉强接起来，也会留下一些大疙瘩，这疙瘩会使心屡屡受到伤害。不能靠自我欺骗活着，这将会伤害爱人的感情。谎言将吞噬爱情。没有爱情，生存的全部色彩都是令人生厌的。

请原谅我，我亲爱的，别了。我没有保住自己的贞洁，我没有权力享受别人的美好世界、他人的爱情。人不可与命争。告别人生之时，我只有一点请求：爱护我们的儿子，让他任何时候也不要感觉到丧母之情。安尼娅·扎列斯卡娅。”

边区内务局技术处笔迹鉴定认定遗书系扎列斯卡娅本人所写。

死后经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认为：死者未患任何心理疾病，具有安静和平衡的性格，没有观察到有病理意义的倾

向。在与人交往中，善于交际，性格开朗。

在信中提到了儿子。从扎列斯基的证言中，我了解到：五岁的谢尔盖在扎列斯基的父母那里，他们住在敖德萨。

案卷结尾是检察院侦查员因缺少犯罪线索而中止案件的决定。

三点钟，我合上案卷。我把一切都给忘了，其中包括通常的和娜佳一起在下午一点钟去吃午饭和答应给彼得罗芙娜打电话。我拨了时装店的电话号码。

彼得罗芙娜首先问候了我的健康情况。我们之间一次也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模样。但我还是一直认为，她和我很亲近。我向她祝贺每一个节日，我知道一变天她就腰痛。同时我给她提供各种信息，如怎样往某个火车站打电话或者哪里有羽绒制品干洗店（这些知识都是我从案头的电话簿上汲取的），这些信息，我们一般是在娜佳从工作地点走到经理办公室必需的时间里交换的。

彼得罗芙娜通知说：

“娜佳不在，去参加游行了。”

“9月份有什么游行？”我感到惊奇。

“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是这么个节日。对于某个人是节日，而对于我们只是忙乱，是时装表演游行。”

“明白了，我忘了你们的工作性质。但没有忘记我们昨天的谈话……”

“听到这话我自然高兴，尽管你是那样的忙……对了，顺便说一下，娜佳说了昨天晚上的事。我崇敬那些为他人幸福尽心尽力的人。”

“您过奖了。”

“正相反，我是褒扬不足了。”